



刘进宝 编著

敦煌文物

敦煌文物的发现，是我国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然而不幸的是，敦煌文物发现于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略中国的时代，许多文物被帝国主义国家的所谓“学者”、“考察团”掠去，一部分为国内官僚地主及私人收藏，造成了我国文化事业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早在1908年，爱国学者陈寅恪先生悲愤地说过：“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于外国，即流于私家。”

流散记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文物流散记 / 刘进宝编著.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226-03838-3

I. 敦… II. 刘… III. 敦煌学—研究 IV. K8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0437 号

责任编辑: 高文波

封面设计: 徐晋林

敦煌文物流散记

刘进宝 编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 插页 字数 千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ISBN 978-7-226-03838-3 定价: 18.00 元

目 录

前面的话	1
震惊世界的大发现	3
一、藏经洞遗书的发现	3
二、土地庙文书发现记	8
三、大胆的推测	13
千载之谜谁解说	
——敦煌藏经洞封闭之谜	16
一、藏经洞原为洪誓(音辩)影窟	16
二、藏经洞封闭之谜	19
丝路文物被盗的历史背景	32
一、总体背景的探讨	33
二、具体原因的分析	38
附录一：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斯文·赫定	
博士所订合作办法原文	51
附录二：《古物保存法》	54
斯坦因敦煌劫宝藏	56
一、斯坦因及其第一次考察	57
二、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与千佛洞骗宝	69



三、斯坦因的收获与英藏敦煌文书	81
“汉学大师”取菁华	87
一、法国的“汉学”研究	87
二、伯希和敦煌劫宝藏	90
三、菁华犹在巴黎藏	99
姗姗来迟的橘瑞超	108
一、大谷光瑞考察团与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外流	108
二、日本的敦煌吐鲁番文书	124
不甘落后的鄂登堡	135
一、组织考察的“俄国委员会”	135
二、鄂登堡与敦煌盗宝	138
三、俄国的敦煌文书	144
带来厄运的华尔纳	151
一、第一次盗劫	152
二、第二次考察与哈佛燕京学社	156
三、损失惨重难挽回	161
劫余断片又遭劫	167
一、敦煌文书的流散	167
二、运京途中遭劫记	169
结束语	174

前面的话

1840年，英国用大炮敲开了中国的门户，随后各国列强蜂拥而至，在强占租界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同时，还纷纷派人来寻宝探险，从而使中国的文化遗产也进入了一个大量外流的灾难期。

1856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既毁坏了这座举世无双的园林，也毁了文渊阁的《四库全书》，劫走了残余的部分《永乐大典》和园中的珍宝。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掠走了清宫廷中珍藏的书画等珍贵的艺术品。除了这两次大规模的强盗式的抢劫外，一些国家的探险家、考察家还以科学考察的名义盗劫了不计其数的中国珍贵文物和艺术品。

据统计，1856年至1932年间，俄、英、德、瑞典、法、日、美诸国曾来我国西北地区考察、探险66次，每次考察都会多少不等的盗劫、骗购一些中国的古迹文物。在各国的考察、探险中，以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日本大谷光瑞考察团、俄人鄂登堡和美国人华尔纳对敦煌遗书、文物的盗劫、破坏最为严重，给中国古代文化造成的损失也最大。因此，我们就以这些考察、探险对敦煌遗书、文物的盗劫、破坏为案例，通过这只麻雀的解剖，来探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文物外流的历史背景及具体情况。

敦煌文物的发现，是我国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然而



不幸的是，敦煌文物发现于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略中国的时代，许多文物被帝国主义国家的所谓“学者”、“考察团”劫去，部分为国内官僚地主及私人收藏，造成了我国文化事业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早在1930年，爱国学者陈寅恪先生就沉痛地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密藏于私家。”^①

敦煌文物外流，是中国文物外流的一个缩影。当然，敦煌是丝绸路上的一颗明珠，敦煌文物是整个丝路文物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为了使我们的分析、研究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上，我们在某些部分的探讨中，可能会涉及敦煌以外的一些地区。

但愿通过我们的叙述，使读者能够明了敦煌遗书的发现，藏经洞封闭的原因及时间，丝路文物被盗的历史背景，各国组织考察团的背景、条件，各国考察团对敦煌文物的劫夺破坏，各国的收藏及研究情况等等，进而对敦煌学和丝路文化有所了解。

^①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震惊世界的大发现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我国各族人民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典籍和文物资料，为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文化典籍和文物资料，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之后，有些已失佚不传；有些还遗存于地下，或密藏于洞窟山岩。可能有一天，它们将被发现而成为世界文化宝藏的一部分。

在古代，曾有两次文物典籍的发现，即汉代的孔壁古文和晋代的汲冢竹书，都与文化有极大的关系。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我国的典籍文物，又有几次大的发现，即河南安阳殷墟甲骨、西陲汉晋简册、明清两代的内阁大库档案、敦煌千佛洞文书。这些文物典籍的发现，尤其是敦煌文书的发现，震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与研究，并由此在世界上形成了一门新学科——敦煌学。

一、藏经洞遗书的发现

敦煌藏经洞文物的发现，距今才一百余年。但由于现存记载相互矛盾，更由于缺乏可靠的历史证据，其发现时间及过程还有待于更深入地研究。



据王道士墓志——《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记载，藏经洞发现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即公元 1899 年。王道士墓志是民国 20 年（1931 年）赵玉明、方至福为其师、师爷道士王圆箓去世百日而立。墓志嵌于莫高窟对岸王圆箓墓塔上，为木质阴刻，面南，高 174 厘米，宽 75 厘米。碑首中央篆刻“功垂百世”四字，其两旁各刻一龙。墓志全文如下^①：

民国廿年古七月卅日，为吾师王法真仙游之百日。门弟子咸愿碑记行略，请命绅耆，众皆曰可，何幸如之！夫吾师姓王氏，名圆箓，湖北麻城县人也。风骨飘然，尝有出世之想。嗣以麻城连年荒旱，逃之四方，历尽魔劫，灰心名利。至酒泉，以盛道道行高洁，稽首受戒，孳孳修练。迨后，云游敦煌，纵览名胜，登三危之名山，见千佛之古洞，乃慨然曰：“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于是建修太清宫，以为栖鹤伏龙之所。又复苦口劝募，急力经营，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此光绪廿五年五月廿五日事也。呜呼！以石室之秘录，千百年而出现，宜乎价重连城，名驰中外也。观其改建三层楼、古汉桥，以及补葺大小佛洞，积卅余年之功果，费廿多万之募资，佛像於焉壮观，洞宇於焉灿烂；神灵有感，人民受福矣！惟五层佛楼规模粗具，尚未观厥成功。陆前县长嘉其功德，委为道会司以褒扬之。今者羽轮虽渺，道范长存。树木



莫高窟下寺（太清宫）

^① 录文经李永宁先生整理，刊于《敦煌研究》试刊第 2 期，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垦田，成绩卓著，道家之香火可继，门徒之修持有资。实足以垂不朽而登道岸矣！夫何必绝食练形而后谓之飞升哉！

千佛洞太清官徒子：赵玉明 稽首谨志
孙：方至福

《墓志》所说的太清宫，俗称下寺，与藏经洞所在的 16 号窟，近在咫尺，东西毗邻，原为王道士的法堂及居室。

立《墓志》者乃王道士的徒子徒孙，并且距藏经洞发现的时间已有 30 年之久。《墓志》中所述情节与实际情节又不完全相符，内有虚构、浮夸之词。所以此说虽有根据，但未必准确，学术界鲜有附会其说者。

另一说发现于光绪二十六年，是年为庚子年，即公元 1900 年，此说目前为学术界所公认。庚子发现说，最早见于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日记》说：“初七日夜敦煌王广文来云：莫高窟开于光绪二十六年，仅一丸泥，砉然扃鐃自启，岂非显晦有时哉。”

叶氏记此事之年，距发现藏经洞只有 3 年，比较可信。

1900 年发现说也见于《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此碑为木质阴刻，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碑嵌于三层楼下层洞窟，今编 16 号窟甬道南壁。碑高 230 厘米，宽 89 厘米。《功德碑记》全文如下^①：

三危为敦煌望山，其西麓有千佛洞。稽诸志乘，即古雷音寺，未详创始何代。梵宇立唐时残碑尚云再修。历年



第16号窟甬道南壁的《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

^① 录文经李永宁先生整理，刊于《敦煌研究》试刊第 2 期，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邈远，迄今无考。但倚幽崖深谷间，疏岩凿石，缔造佛像万计。或装塑宝座，或绘画悬壁，色相庄严，灿然妙善，足征西域当年修佛之盛也。后经兵燹蹂躏，佛像屡遭毁废，龕亦沙压倾圮，梯级多断，攀缘莫逮。千百载而下，追溯古迹，每足动人感慨之思。然兴者不废，废者复兴，尤存乎其人而已。丁酉之岁，邑从九戴君奉钰倡首续修，聚众善之财力，营艰大之工程，左提右挈，其运意为独挚矣！始构大雄之殿，继兴大士之官，畴昔荒刹萧索，不蔽风雨，今则洞宇峥嵘、观瞻辄资景仰。苟非竭诚补葺，即阅五六年，殊难告厥成功。而鄂省羽流圆策，又能宏乐善之心，不辞劳瘁，不避星霜，旋睹迤北佛洞寂寥，多为流沙所淹没，因设愿披沙开洞。庚子孟夏，新开洞壁偏北，复掘得复洞，内藏释典充宇，铜佛银座，侧有碑云唐大中五年沙门洪誓立。参考正史，建中二年沙州沦陷吐蕃后，逾七十年，刺史张公义潮正于大中五年以瓜沙等十一州收复归唐。遂改沙州为归义军，以义潮作节度使。由大中而至于今，且千有余岁，是圆策孤志劈画，吾乡人众创见千岁遗蕴之物，亦甚异。圆策测度藏经佛龕，结造三层楼，仍属戴君奉钰提倡而振作之，庙貌焕乎维新。功既竣，请余援笔而付剞劂。谨略述其梗概。若夫润色鸿业可大可久，更于继起有厚望焉！是为记。

敕授文林郎、侯铨试用知县、丁酉科选拔联捷举人郭璘谨撰并书。

例授登仕佐郎、吏部候选巡政厅、从九品、经理社首戴奉钰督修。

例授修职郎、吏部注册即选儒学训导、岁贡生、社首习登瀛监修。

例授修职郎、吏部注册候选儒学训导、附贡生、社首马育江监修。

经理社首戴号公 陈正言 杨春洲 殷善言 戴化勋 胡从义

住持 王圆策

徒：王明发 赵明裕 仝修。

大清光绪三十二年岁次柔 兆敦牂孟夏之月上浣穀旦 立

此碑所记“庚子孟夏”发现说，有可能源于王道士之口，因为王道士曾亲自参与三层楼修建之事，所以其说比较可信。

1900年发现说，还见于王道士的《催募经款草册》（又名《王道士荐疏》）。此件为梅红纸墨书，现存敦煌研究院。《草册》是以王道士名义写出，上报催拨经款的。《草册》^①说：

^① 《草册》原文引自子青《记王道士催募经款草册》，载《西北日报》1945年5月22日。姜亮夫先生《莫高窟年表》附录也录有此《草册》。

湖北省麻城县人，现敦煌千佛洞住持王圆箴，敬叩，伏俯叩恳

天恩活佛宝台座下，敬禀者：兹有甘肃敦煌古郡迤郡东南方距城四十里，旧有千佛洞，古名皇庆寺。其洞在石山之侧，内有石佛石洞泥塑佛像，俱有万万之像。惟先朝唐宋重修，碑迹为证。至本朝光绪皇帝年内，因贫道游方至敦，参拜佛宇，近视洞像，破毁不堪。系先年贼匪烧损，贫道誓愿募化补修为念。至贰拾陆年伍月贰拾陆日清晨，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壹所，内有石碑一个，上刻大中五年国号，上载大德悟真名讳，系三教之尊大法师。内藏古经万卷，上注翻译经中《印度经》、《莲花经》、《涅槃经》、《多心经》，其经名种颇多。于叁拾三四年，有法国游历学士贝大人讳希和，又有阴国教育大臣司大人讳代诺二公至敦煌，亲至千佛洞，请去佛经万卷。异日覆蒙天恩赐银壹万两，近闻其名，而未得其款，以将佛工不能成就。区区小县，屡年募化，至今创修寺院，以及补塑佛像，重修楼殿等项费用，过银二万有余。缘为经款，叩恳青天佛祖电鉴，特修草册上达，肃此

谨禀

《草册》对藏经洞的发现时间说得十分具体，即1900年6月22日，与庚子孟夏之说吻合。而且还提到贝希和、司代诺（即伯希和、斯坦因）二人“请”去佛经万卷之事，故此件应写于1908年之后不久，应当说是可信的。

此外，伯希和、斯坦因等人，都说藏经洞发现于1900年，他们二人必亲闻之于王道士，所以与庚子发现说一致。

还有一种说法，即王圆箴做了道士，来到敦煌后，生活无着，投宿于莫高窟。此时的千佛洞寺院，多为红教喇嘛，诵的是番经，惟独王圆箴能诵道经，说中原语言，所以人们大都求他礼忏。其生活因此渐渐好了起来，于是就雇一杨某写经。杨某在第16窟甬道中置一桌案，经常在此伏案写经。抄经休息时，常以芨芨草点旱烟吸之，也经常把燃余之草插在墙壁裂缝中。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夜半，杨某又在此伏案写经，这次他与往常一样，吸完烟后就把燃剩的芨芨草插在背后墙壁裂缝中。奇怪的是这次却草插而不可止，用手击之，发现内中是空的，因而甚感惊异。杨某把此事报告了王道士，王道士即与杨某合力破其壁，内有一门，高不足容人，用泥块封塞，把泥块去掉，则为一小甬道，入内为一复洞，由此发现了藏经洞。此说没有旁证，也近于传奇，聊备一说，仅供参考。



二、土地庙文书发现记

敦煌遗书，主要是指1900年藏经洞发现的大批遗书而言。除此之外，还应包括1944年土地庙残塑中发现的少量文书。

1944年7月初，前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为建职工宿舍，准备拆除中寺后院中的土地庙，先将庙内土地、山神、牛王、马王、药王等五尊残塑像搬出，放置在土地庙外西墙根下。8月30日上午11时许，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职工（警长）窦占彪打破其中三尊残塑，发现残塑体内中心支柱上缠裹着一些经卷，当即由警长窦占彪和泥工秦司等将这些经卷持送到所长常书鸿同志的办公室。常书鸿同志让研究人员苏莹辉、刘荣曾共同检视包封。下午4点，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人员常书鸿、董希文、李浴、张琳英、陈芝秀、邵芳、苏莹辉、陈延儒、辛普德、刘荣曾等留所全体同志，在考古组启封检点，“并敦请中研院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组夏作铭（鼎）、向觉明（达）、阎述祖（文儒）三先生莅场监视，以昭郑重”^①！由苏莹辉、李浴、刘荣曾记录登记。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全体职工合影

^① 苏莹辉《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新发现北魏写经颠末记》，载《西北日报》1944年12月1日。

关于土地庙文书的发现，最早最基本的记录是当时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先生之报告：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於民国三十三年八月三十日发现藏经初步检验报告

本所因修建职员宿舍，於八月三十日上午十一时，在后园土地祠（该庙为清末中寺主持王喇嘛所修）残塑中发现六朝残经多卷，当经鸿召集全体职员并邀请现正在千佛洞工作之西北考察团考古组向达、夏鼐、阎文儒三先生参加检验，详细记录。计共得六朝残经杂文等六十六种，碎片三十二块；其中有题记年号者，计北魏兴安三年五月十日谭胜写弥勒经，北魏太和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写佛说灌顶章句拔除罪过生死得度经及北魏和平二年十一月六日唐丰国写孝经残页三种。此外尚有六朝职官名册残页，均甚名贵，现经匆促编造初次查验目录。该项残页现妥存本所，此次发现，实为史坦因、伯希和等盗窃藏经后敦煌之创闻，本所成立于盗窃俱空之际，有此意外收获，致使震动世界之“敦煌学”又增加若干研究资料，亦中国文化之幸也。

常书鸿谨志于莫高窟

三十三年九月一日

参加检验本所职员：

常书鸿 张琳英 刘荣曾 李 浴
陈延儒 苏莹辉 邵 芳 陈芝秀
董希文 辛普德

监验人：向 达 夏 鼐 阎文儒

纪 录：苏莹辉 李 浴 刘荣曾^①

另外，著名敦煌学家、当时作为监验人之一的向达先生，在同年就发表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六朝残经》^②一文，对此也有简单记述：“难为王道士当时除隐匿不少外，并将经卷任意置于新塑佛像府（腹）中。最近国立敦煌

^① 该报告见苏莹辉《敦煌学概要》（修订再版），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1年10月版。

^② 原载《图书季刊》新5卷4期（1944年12月出版）。又见阎文儒、陈玉龙编《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950年秋敦煌文物研究所职工合影

研究所于八月三十日所经（得）六朝残经，即王道士藏于佛像腹中者也。

研究所后园原有一土地庙，中杂置土地及龙王像。研究所近将土地庙改为工人住室，工人遂于弃置外间之新塑二残像中发现残经一大捆。此间塑像，显以二木杆缚成十字，于木杆上缠以芦苇或芨芨草，然后再傅以泥土，加以搏捏。今此发现残经之塑像，即以经卷替代芦苇，是以外傅之泥土破裂，经卷即赫然外露。研究所予以初步点查，计编六十八号，凡七十余段。”

8月31日，窦占彪又持来经卷一包，说此乃研究所临时雇员泥瓦工马志华、秦志和将另两尊残塑打破，从土块夹缝中获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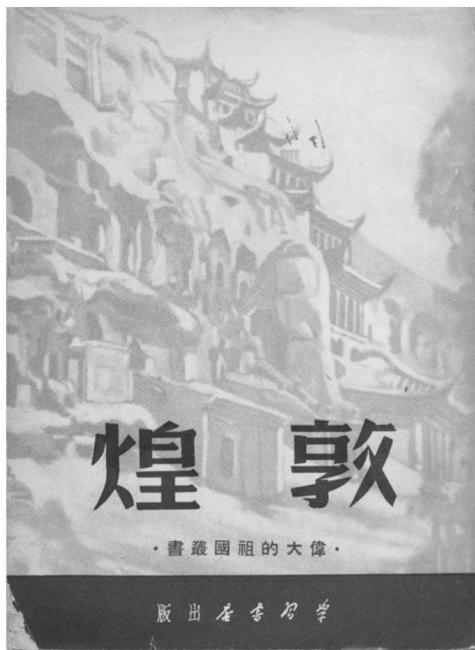
1944年8月30日和3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从五尊残塑中所获经卷，经过检查清点，计有佛家经、咒、疏等79件，编为61个目录号。孝经2件一个编号，诗经、记账单、北朝幢将花名册、抄经起讫记录等各一件，各占一个编号。此外，尚有写卷碎片32件，分做两包，各占一个编号，由苏莹辉整理编目。

土地庙文书的发现，当时即引起了学术界重视。中央社为此发的《六朝藏

经敦煌发现》^①的消息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于八月三十日修建职员宿舍，于后园土地庙残塑中，发现六朝藏经杂文共六十六种、碎片三十二块……此种意外收获，致使震动世界学者之‘敦煌学’，更增加若干资料。”苏莹辉当即介绍了土地庙遗书的发现始末，并很快发表了藏经目录。^②

土地庙发现的遗书，共 68 卷，除苏莹辉所编目录之第 11 号《诗经残卷》，1951 年在首都举办敦煌文物展览时携至北京，一直为故宫博物院保存外，其余 67 卷均藏敦煌研究院。1977 年《文物资料丛刊》第一辑公布了施娉婷、刘忠贵整理的《敦煌文物研究所藏敦煌遗书目录》，该目录包括土地庙遗书。为了与藏经洞遗书相区别，在每卷卷名末尾注一“土”字，混编于院藏目录之中。

关于土地庙遗书的性质，即是否为藏经洞遗书的组成部分？由于清宣统二年（1910 年）敦煌遗书运送北京时，王道士私藏了一部分，1912 年初，日本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曾从王道士手中骗购了一些；1914 年，斯坦因第二次来敦煌时，也从王道士手中骗购去 600 多卷。因此，当时一些学者即认为土地庙遗书是王道士藏匿的藏经洞出土文书。如前引向达先生文中即持此说。另外，当时西北考察团考古组成员、土地庙遗书监验人阎文儒先生也说：“1944 年 8 月 30 日，我们在莫高窟住的时候，国立敦煌文物研究所（应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因建职工宿舍，在中寺后园土地庙残塑像内，发现了六朝残经六十七卷，残片一包……这像是王道士所造的，在塑像时为修功德，他特将许多石室中的卷子，缠在像的中心柱内。在百劫之余，又出现于人世。”^③傅振伦先生在《敦煌千



向达等《敦煌》

① 《西北日报》1944年10月12日。

② 苏莹辉《记本所新发见北魏写经（附录）》，载《西北日报》1945年4月24日、5月9日。

③ 阎文儒《莫高窟与敦煌》，载向达等著《敦煌》，学习书店 1951 年版。



佛洞文物发现的经过》^①一文中也持同样的看法，即1944年“还在清末王道士所造的泥塑佛像身中，发现了六十九卷的写经”。从上引向达、阎文儒、傅振伦先生的论述可知，他们都认为出土经卷的土地庙残塑像，乃是王道士所造，由此便意味着土地庙文书原为藏经洞旧物，是藏经洞遗书的组成部分。

到了80年代，随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伴随着敦煌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土地庙遗书性质的探讨，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84年8月，敦煌研究院李正宇先生为探明这一疑案，专门走访了土地庙遗书出土时的两位当事人——窦占彪和常书鸿。

窦占彪告诉笔者，他听当年上寺主持喇嘛易昌恕和中寺主持杨和尚说，他们的师祖师父讲，土地庙的五尊塑像，原在今莫高窟画店西侧一座不知建于何时的庙里，此庙年久倾圮，清代修建中寺才把那五尊塑像搬到中寺后园，另建土地庙予以安置供养。常书鸿先生告诉笔者，他听易喇嘛说土地庙是道光十七年修建的。

李正宇先生根据访问的有关情况总结：“参酌窦、常二位先生转述的口碑资料，我们大概知道，土地庙建于道光间，而土地庙中的五尊残塑，则是从别处搬来的，其塑造的时间又当在道光十七年之前很久。”并结合有关材料判断：“土地庙不是王道士所修，五尊残塑中所出经卷也不是王道士藏纳的。当然这宗遗书也不是藏经洞散出之物。”^②

对敦煌遗书研究有素的日本著名敦煌学家池田温先生，也对土地庙遗书进行了详细探讨，他认为土地庙遗书皆属5世纪中叶，其内容多样而全为断片。如果王道士要挑选数十件残卷装入塑像的话，为什么他只挑选北魏中期的卷子，而且还都是零碎断片呢？因此，池田温先生“断定土地庙遗书之来源一定不由藏经洞遗书”。并根据各方面情况进行了推测：“五世纪写经之类，除敦煌以外吐鲁番及龟兹地方均曾有发现。其内容及形式大概相似，并无明记钞写人地之跋文，辨别颇为困难。土地庙遗书之制作地，固然敦煌地方可能性大，但是未得明证以前，尚应考虑其他地域为妥。”^③

既然土地庙遗书并非藏经洞旧物，那么作为整个敦煌遗书的有机组成部

① 载《文物参考资料》第2卷第4期，1951年4月版。

② 李正宇《土地庙遗书的发现、特点和入藏年代》，载《敦煌研究》第3期，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 池田温《1944年莫高窟土地庙塑像中发现文献管见》，1987年香港“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会议”论文。

分，它与藏经洞遗书相比，有何特点呢？

根据学者们对土地庙遗书的考察、研究，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特点：

(1) 时代：土地庙遗书都是唐以前的早期写本，它上起北魏，下至隋代，绝大部分属北魏中叶。而藏经洞遗书则以唐五代写本为主，北魏的资料比较缺乏，因此从时代上看，土地庙遗书具有较大的价值。

(2) 内容：土地庙遗书中没有道教、景教、摩尼教经典，意味着这批遗书收藏之日，道教、景教、摩尼教在敦煌尚未盛行，表明在北朝时期莫高窟还仅仅是一座佛教圣地。到了唐代，莫高窟不仅是佛教圣地，而且还是中西文化交流和各种学术文化荟萃之地。因此，土地庙遗书品种单调、范围有限，不像藏经洞遗书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另外，土地庙遗书全是汉文文书，没有一件西域文字和古代少数民族文字写卷。而藏经洞遗书除以汉文文书为主外，还有梵文、康居文、于阗文、龟兹文、突厥文、回鹘文、吐蕃文等各种民族文字的写卷。

(3) 形式：藏经洞遗书除写卷外，还有印本、拓本，而土地庙遗书无一印本、拓本，装帧形式单一，它表明在北魏时代，拓印、印刷和装帧尚不发达，至少表明新的装帧技术尚未传到敦煌。^①

三、大胆的推测

除了藏经洞遗书和土地庙遗书外，敦煌是否还有其他的批量遗书发现？早在伯希和的敦煌笔记中，就已经对此作了初步探讨。在伯编 181 号窟，即敦编 464 号窟中，伯希和有这样的记录：

该洞部分地被废物碎片堵塞。稍微清理一下就可以拍摄它了。我们于那里发现了用于印刷蒙文书籍的大量小方木块，它们各自能印出一个完整的字来。那里在元代可能于该洞中有一个刊经厂。那里也有汉文、藏文、婆罗谜文和蒙古文的残卷，同时也有一些西夏文刊本短篇残书。这是一种新奇事。我让人完成了对洞子的清理，大家于那里最终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印有西夏文的纸页，它们至少属于 4 部不同的书籍，1 本几乎是完整的蒙

^① 参阅李正宇《土地庙遗书的发现、特点和入藏年代》，载《敦煌研究》第 3 期，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池田温《1944 年莫高窟土地庙塑像中发现文献管见》，1987 年香港“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会议”论文。